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The Logic of Liberty

自由的逻辑

[英]迈克尔·博兰尼◆著
冯银江 李雪茹◆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The Logic of Liberty

自由的逻辑

[英] 迈克尔·博兰尼 ◆ 著

冯银江 李雪茹 ◆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的逻辑 / (英)博兰尼著;冯银江,李雪茹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1

(人文译丛)

ISBN 978-7-206-07202-4

I. ①自…

II. ①博… ②冯… ③李…

III. ①自由—文集

IV. ①D0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6789 号

自由的逻辑

著 者:(英)迈克尔·博兰尼 译 者:冯银江 李雪茹

责任编辑:崔文辉 王 黎 封面设计:张 迅 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12.5 字数:171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202-4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葩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须。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憚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



胡君维革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重版总序

凡是在出版业工作的人都知道一句行话，叫做“选题定位”，或曰“图书定位”，亦曰“市场定位”。我非常赞成这句话。一个出版社必须进行明确的选题定位，只有明确的选题定位，才能打造图书品牌乃至出版社品牌，只有有了品牌才能占领市场，出版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近些年来，我社的选题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主打国内外学术类图书。就国内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实录》（10卷）、《北大哲学门》（10卷）、《高清海哲学文存》（6卷）、《孙正聿哲学文集》（9卷）、《楚辞源流选集》（5卷）、《中日甲午战争全史》（6卷）、《毛泽东评点的帝王大传》（16本）、《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6卷）等高档次、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就国外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引进出版了《人文译丛》（60本）、《绿色经典文库》（16本）、《大美译丛》（8本）、《支点丛书》（10本）、《世界经济畅销书系》（10本）、《人类文明史图鉴》（24本）、《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本》（22本）、《美国思想史》、《西方建筑史》、《剑桥战争史》、《剑桥医学史》等在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好评。从总体上说，图书的价值主要在“传承”和“传播”4个字上。“传承”是就历史纵向而言，图书要为后人传承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成果；“传播”是就历史横向而言，图书要向世人传播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知识。我社出版的学术类图书，虽然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但我们一直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我社引进出版的外国学术类图书中，最有影响的是何怀宏先生担

任总主编的《人文译丛》这套丛书。何先生是一位学术精深、工作认真、待人诚恳、诲人不倦的专家学者。为编好这套丛书，他亲自确定书目、遴选译者、审阅书稿，每一本书都饱含了他的心血。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 10 年的努力，到现在这套丛书一共出版了 60 本。一个地方人民出版社能够出版一套 60 本的外国学术著作丛书，实属不易。每当看到这套丛书时，我们总是对这套丛书的总主编何先生产生由衷的敬意。

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文译丛》这套品牌性图书，最近，我社调集 30 多名资深编辑，对这套丛书进行了重新出版。在重版过程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第一，将已经出版的《人文译丛》中的图书悉数收入，同时又从我社出版的外国学术著作中选出 20 本，加在《人文译丛》中，使《人文译丛》总量达到 80 本。第二，将收入《人文译丛》的 80 本图书，统一开本，统一纸张，统一版式，统一封面风格。第三，对 80 本图书进行重新编辑校对，对个别图书的有些文字或段落进行了处理。通过以上工作，使这套丛书更加完善了。

有人说：翻译出版一本外国学术著作，比自己撰写出版一本学术著作还要难。这话很有道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重版的《人文译丛》尚存在着以下三点不足。第一，有个别图书，从学科属性上讲，放在《人文译丛》中不甚合适，敬请广大读者原谅。第二，有些图书中的个别译文还不够准确，编校也不够到位，敬请广大读者指正。第三，有些图书中的思想观点，囿于历史局限，我们不能接受，敬请广大读者进行批判性的阅读。

重版《人文译丛》，对我社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三个多月的工作中，全体编辑、校对、照排和印制人员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令我感动不已。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真有许多感谢的话要说，纸短情长，不尽一一。

胡维革

2010 年 9 月 28 日

于长春百汇街寓所

前 言

使人非常遗憾的是，只有在我们按照潜藏于心里的一种理念的暗示，花了许多时间胡乱地收集材料之后，而且事实上又是在我们只就一种技术的方式长期集合了这些材料之后，我们才首次有可能更清楚地看出这个理念，而按照理念的种种目的，以建筑术的方式来计划一个整体。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①

这里收入的是我8年来所写的一些文章。它们表现了我不断发展的努力——便是阐明自由的地位，以回应我们这纷扰动荡的历史时期提出的各种问题。我依次重点考察了自由的诸个方面，因为在时代的进程当中，这些方面逐渐暴露出自己的弱点。这一论证揭示了相关论题颇多的领域；同时，该论证还会提出些在战斗当中得以证明的有效答案。我曾想把材料融会贯通，再将其注入到综合体系的模型当中去，不过这未免显得不够成熟。若非先建立一个较之我们今天为着坚持信念而怀有的思想更好的基础，这样的尝试便无法进行。

不过我还是希望，我的这一文章汇编能够为未来的一种前后一致的学说提供某些要素。因为，本书通篇还是表现出一种思想上一致的路线。在这里，我比从前更其认真地考量了科学可信托的预先假设；这便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对科学知识的发现和接受，乃是对我们所持某种信念的寄托（commitment），而其他人则或许会拒不接受这一信念。这样，科学当

中的自由，俨然便是寄托于某种信念的一个团体的自然法，而同样的结论亦可以靠类比用之于其他的各种智识自由。若遵循这样的路线，思想自由的正当性，一般便可以就我们对思想力量的信念，就承认我们培养内心事物的职责，来得到证明。一旦寄托于这样的信念和职责，我们就必须支持自由；可是在这样做的时候，自由却并非我们关心的首要问题。

我是把经济自由，视为管理特定生产技术适宜且不可或缺的社会技术。虽然如今我们深切信奉着这种技术，总有一天，其他的选择会抛头露面，并有力地宣称自己的长处。

个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自由——只要他尊重别人类似的权利——在此一自由理论当中只起很小的作用。私人的个人主义，并不是公共自由的重要柱石。自由社会还不是开放社会，而只是充分献身于一系列独特信念的社会。

我主张的是承认科学及一般思想可信托的基础，而拒绝的是自由的个人主义公式，这两者之间颇有着关联。该公式惟有在 18 世纪理性主义的单纯当中，在彼时天真自明且坚定不移的科学真理当中，才能得到支持。而现代的自由，立足于对其可信托基础的全面批判上面，必得以更为积极的术语来构想。它的主张必须予以更加严格的界说，同时还要厉兵秣马，防备新的敌人——这些敌人，比之现代欧洲较为文雅的世纪里自由初尝胜果时的敌人要可怕得多。

我相信，这些综合性的问题无法以超然的态度来处理。对待这样的问题，需要将此一论题作为自己主题的作者充分的参与。因此，我也收入了一些在争论时所做的演讲。

注 释

[1] 康德《纯理性批判》，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88页。——译者

目 录

前言	001
----------	-----

第一部 科学方面的事例

1.纯粹科学的社会启示	003
2.科学的确信	008
3.学术自由的基础	031
4.科学的自治	046
5.科学与福利	064
6.计划化的科学	081

第二部 其他方面的事例

7.前后矛盾的危险	089
8.集中指导的范围	105
9.利润与多中心性	131
10.管理社会事务的可能性	146



第一部 科学方面的事例

1.纯粹科学的社会启示 [1]

(1945 年)

应用科学有着明确的目的：它服务于我们的福利与安全。然而，纯粹科学又怎样呢？这种科学研究不存在可见的实际功用，对这种研究的正当性如何证明？直到晚近时期，一般还往往假定，这样的研究只服务于其本身的目的，服务于对真理之爱的知识的发现。我们是否还要接受这样的观点？我们是否还要相信，科学家耗费公共资金，去搞这样的一些研究——比方费马定理的证明，或者计数字宙间的电子数——乃是恰当合理？这样的研究，虽然或许并不缺乏实际用途的某种间接可能性，却毕竟难以认为，它能像正常领域当中的任何人类行为那样，产生实际的收益。不，我们目前一般不接受这样的观点，一如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那样，认为科学正应该为知识的缘故而追求知识，而不管其对社会福利的任何增进。这一变化并非来自环境的变化，而表现了公众舆论的一种根本转变——该转变乃是来自于近年来某种决定性哲学运动的诱发。

这样，对于科学的传统立场疑心重重的哲学运动，从两个不同侧面开始了进攻。一条战线径直指向的是科学按其自身的资格讲话的要求。这条战线便是现代唯物主义的分析，它否认人类的智力能够在其自身的基础上独立运作，而主张思想的目的根本上乃是实践性的。依照这种观点，科学不过是种意识形态，其内容要由社会需要来决定。因此，科学的发展，要由新的实际兴趣的相继出现来解释。比方说，牛顿便表现为回应对航海的兴趣之兴起，而发现了万有引力；而麦克斯韦则表现为受到横跨大西洋通讯需要的刺激，而发现了电磁场。这样的哲学，否认纯



粹科学有着其自身的目的，将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区别一扫而光。于是对纯粹科学的评价，主要依据的是其并非全然纯粹的性质——依据的是这样的事实，即它到头来会证明为有用处的性质。

另一条战线乃是基于道德立场。它主张科学家应当将目光转向充满于世界的苦难，思考能够为其求得解除苦难的良方。它问道，看一看周围，他们是否还能在自己的心中发现这一点，即将自己的才干，仅仅用于某些抽象问题的解决——诸如计数宇宙中的电子数，或者费马定理的解答。他们能如此自私地来证明吗？科学家因其单纯为了知识之爱而对科学进行的探究，受到了道德上的指责。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纯粹科学的阵地受到基于殊为不同的立场的两条交叉火力的攻击；这构成了某种相互矛盾的观点的结合——不过，在现代思想当中这倒实在是一种典型。这里有一种新型的破坏性怀疑主义，结合了新型的社会良知之激情；对于人类精神彻底的怀疑，却与过度的道德需求并行不悖。我们看到，这里起作用的是这样一种行为模式，它已经对现代世界，做出了如此之多破坏性的打击：它挥舞的是社会激情之锤，击打的是怀疑主义之凿。

这唤起了对我们的问题更加广泛的蕴涵，而欧洲的景象正揭示出这一点。对我们文明的破坏正在欧洲大陆泛滥开来，这并不能归之于法西斯主义兽性的某种偶然爆发。与此相反，始于俄国革命的那些事件毁坏了欧洲大陆，它们表现的却是单一的连贯过程，便是一种大规模的总体剧变。人道主义、爱国情感的洪流是其初始的刺激，正是这种情感，实现了对欧洲的破坏。野蛮经常潜存于我们中间；然而，惟有反叛的道德热情先打碎了文明的控制，野蛮才能得到大范围的释放。潜在的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总会存在；然而，惟有他们为自身的目的，成功地将道德的力量引入了歧路，他们才能够获得力量。

这样，我们必须问，为什么道德的力量会被如此引入歧路？为什么我们时代巨大的道德热情，会导向暴力与破坏的渠道？惟一能够做出回答的是：再没有可以用于疏导的其他渠道。激进的怀疑主义破坏了公



众对正义与理性现实的信仰。它为这些观念打上的印记不过如此——要么单单是意识形态，要么仅仅是藏身其后的自私利益之掩护——而其实不过是为信徒们带来混乱与虚弱的根源。

并没有什么对正义及理性充分且有力的信仰留存下来，其中得以体现着社会的热情。成长起来的一代，充满着道德的火焰，对理性与正义则是不屑一顾。他们取而代之信仰的是什么？——是那些剩给他们供信仰之用的力量——是权力，是经济利益，是潜意识的欲望。因此，他们将这力量，当作自己可以托付自身的终极现实而接受下来。在这里，他们可以替自己的道德志向，找到现代的尖锐体现。同情转化为无情的仇恨，兄弟情谊的愿望，转化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战争。爱国主义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兽性；而那些更加邪恶、更加爱国的人，便走向了法西斯主义。

近来阿特利先生便描述了当今欧洲最为迫切的需要。“我们需要，”他讲，“一种正义的观念，不是作为某个阶层的意志，而是作为某种绝对的东西”，以及领导权，“它将引导人民从单纯对物质利益的渴望，上升到对人类最高使命的意识”。而贝文先生讲起话来也是一样的风格。面对欧洲饥肠辘辘的大众，他谈的是一种“精神的饥饿，这要比物质的饥饿更具破坏性”。

然而不幸的是，由过去的世代里那些领导性的哲学运动卓有成效地灌输进我们的头脑里的学说明确教导的却是这样：正义不是别的，正是某个阶层的意志；同时再没有什么能够比对物质利益的渴望来得更高——因此侈谈什么更高的使命，不是愚蠢，便是欺骗。今天最为迫切的需要，在每一方面都同这种哲学正相对。对我们科学家，它在与科学的关联方面开始大打出手。我们对今日世界应做的最生死攸关的工作，便是恢复我们自身的科学理想，在现代哲学运动的影响之下，这一理想已经变得名誉扫地。我们必须主张，科学的本质就在于对知识的爱，而知识的功用绝非我们关注的首要内容。我们必须一再为科学要求公众的尊敬和支持，追求知识且只追求知识的科学应受这样的尊敬和支持。因

我们科学家宣誓效忠的，乃是比物质福利更其珍贵的价值，乃是比物质福利更为紧迫的工作。

纯粹学术的精神与极权主义的要求之间如此尖锐的对立，在现代历史上的许多残酷事件当中，都能得到充分的证明。在极权主义统治下坚称自己标准纯洁性的大学，毫无例外会受到严酷的压迫，往往还要遭到沉重的惩罚。在今天，整个世界都认识到有负于波兰和挪威的大学，有负于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大学，它们抵抗了这样的压力，经受了这样的惩罚。这些地方是今天确信我们欧洲文明基础的见证，是它们展现着欧洲复兴真正的希望。与此相反，在其他一些地方，大学听任自己屈服于恐吓利诱，而危及其标准；我们觉得，我们文明的根源也遭到了损毁。在这些地方，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已变得奄奄一息。

今日世界对科学的需要，首先是作为良好生活的范例。尽管灭顶之灾不断发生，即令今天，遍布这行星上的科学家们，依然构成伟大而良好的社会之主体。甚至目前，莫斯科与剑桥的科学家，班加罗尔与旧金山的科学家，尊敬的都是同样的科学标准；在溃败的德国及日本的深渊当中，科学家依然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坚持的是科学工作的同样法则。虽然我们今天相互隔绝，我们却依然带有共同的智识遗产的标记，决意做同一伟大先驱的后继者。

这便是我对于当今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观点。在为我们的文明而进行的伟大斗争当中，科学占据着前线的一翼。在破坏纯粹科学地位的运动里，我看到了攻击我们整个文明的分遣部队。我要说，这一分遣部队，体现的是当今某种最为野心勃勃、也最为宽宏大量的情感——然而惟其如此，在我看来它才更为危险。我们在这场战斗当中，必须为人类进步的某些最好的动机而战。不过我们无法听凭自己因此而屈服。现代怀疑主义轻而易举的智慧，毁灭了人类精神的指导，又释放了大量粗鲁未开的热情，这已经令我们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纵令那些在我们对纯粹科学的信念当中发现了老式作风的人嘲笑我们，纵令另一些认为我们自私的人谴责我们，我们还是必须坚持对于科学理想的捍卫。





注 释

[1] 1938年8月，英国科学促进会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科学的社会与国际关系部，起初该部的主要动机在于希望对科学的进步施以有意的社会指导。随后的几年里，该运动聚集了很大的势力，因此1945年12月该部开会讨论科学计划化（Planning of Science）时，我预料该会议会以压倒多数，赞成计划化。我的开幕演说《纯粹科学的社会启示》，便是考虑到这一前景而写就；不过事实却证明，这次会议构成了一个转折点。报告人和听众一致赞成纯粹科学的传统地位，支持其为自身的理由而进行自由的探求。由此以来，在英国科学计划化的运动一蹶不振，直至无足轻重的地步。

